

“自然”与唐宋古文的内在法度

张甲子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自然”从南北朝便进入文学理论的讨论视野。刘勰、萧统等人推崇的是文采自然、文质相济;中唐古文运动兴起后,在重建文统的进程中,古文论家对“自然”有多方面的省思;在北宋初年的古文运动中,古文论家更是对文理自然、文法自然有清晰的认识,这也是宋代古文自成一家的原因之一。文学理论中对“自然”的阐释步步深入,不仅使“自然”成为了古文创作的内在法度,也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古文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自然;文采自然;文理自然;文法自然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7)01-0041-07

“自然”成为中国文论的共识,经历了诸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至宋朝方完全为大家所接受,只因在漫长的演进中,“自然”的含义及其特征不断被重新界定。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共提到“自然”9次,意取自然而然;唐李商隐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评论元结古文时,论及“其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于性命之时。……次山之作,其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意取仿象自然;北宋苏轼《答谢民师书》则言:“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意取不加雕饰,非怵心剜目雕琢者之所为也。正是经过了从南朝小品文、到唐代古文运动,再到宋代散文的不懈努力,古文才彻底形成了以自然为美的追求,并完美塑造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

一、“自然”与文论的自我调适

《文心雕龙》所论“自然”,糅合了天地自然之道与人文自然之道。《文心雕龙·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前半句的

“自然之道”,是“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这中间有连接“道”与“文”的关节,乃是“心”之用,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65}。为文之始,有感而发,物色变幻,心之摇曳,心生而后能言,有情而后造文,文章的命意、修辞等“皆本自然以为质”,并且“为文定势,一切率乎文体之自然”^{[2]132}。刘勰涉及了创作过程的诸多环节,《定势》:“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丽辞》:“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隐秀》:“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体性》:“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处处体现着文出“自然”的观念。

这样的“自然”,是人性之自然与文采之“自然”的综合体。其一,所谓人性自然,是性情出于自然、才性出于自然。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禀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再有,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此中性情

收稿日期:2015-12-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建构与两汉文学格局的形成”(12YJC751005);河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浊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塑造”(2015CWX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甲子(1984-),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汉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化。E-mail:zhangjiayi1984@2008.sina.com

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肯定了自然天成的情感、才气是为文的前提。其二,所谓文采自然,《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有言:“……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在前者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择取言辞来表达,非有意为之,却如潮之波澜起伏,境遇之困厄穷通,纯属“天造”,毫无雕琢痕迹,卖弄姿态。对“自然”如此解释,正是在日渐成熟的文论中越来越惯用的套路,阐述文学观念之前,往往先表述一番经天纬地的“道”的思想,再置换为人的真性情,最后等同于具体作品的创作。也就是说,用“自然”在各层面之间寻找契合点。如初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李延寿《南史·文学传论》、魏徵《隋书·文学传序》等,皆是实例。甚至,纪昀还曾以此认定《原道》中的“自然”,即是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前奏^{[3]24}。

南朝人所理解的“自然”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不能用后世的观点强附。刘勰提出、或者说综合的“自然”,仅是前人观念的汇集,其本身的薄弱环节在于,刘勰自己未曾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不能体会到实际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颇有意思的是,刘勰畅言不要过度修饰言辞,而《文心雕龙》恰又是用骈文的体裁写就,繁文绮合,锦心绣口。这本身便是悖论,显现出文论家与文学家的差距。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我们再看在沈约、萧纲和萧绎等人的手中,“自然”便呈现出了另一种状态。

萧纲《与湘东王书》:“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这不单是对谢灵运诗歌的评价,也是对谢灵运诗文风格的整体界定。其出于“自然”的原因自不必多说;其糟粕之处,则类似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总结的“三体”之弊端,“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还有黄侃归纳的:“纵观南国之文,其文质相剂,情韵相兼者,盖居泰半,而芜辞滥体,足以召后来之谤议者,亦有三焉:一曰繁,二曰浮,三曰晦。繁者,多征事类,意在铺张;浮者,缘文生情,不关实义;晦者,审易故

训,文理迂回。”^{[2]132}对于这个问题,沈约之前便看的清楚,他提出“三易”说,正是针对于此的策略。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史述中,沈约一方面反对质木无文,一方面倾情赞颂“英辞”、“清辞”、“盛藻”、“遒丽之词”,两边取折中之道,要的是“文之所以贵对偶者,谓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者也。”与《南齐书·文学传论》大同小异,强调的是“吐石含金,滋润婉切”、“不雅不俗,独中胸怀”,在文质相济、情韵相间中,不偏不倚地斟酌损益。

再看《与湘东王书》接着所论:“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屈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无论是专尚华辞,还是专崇朴陋,都会使文章失去“自然”,他们心中的典范,是“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这种文章的审美观,因为具有中和之质,在文论中延续了极长时间。

此后的隋及初唐遵循旧例,无名氏的《论体》论文章有博雅、清典、宏壮、要约、切至等几种风格,优劣并立,“博雅之失也缓,清典之失也轻,绮艳之失也淫,宏壮之失也诞,要约之失也阙,切至之失也直。”其大意祖述六朝成说,不见新意。后又言:“辞能成练核,动合规矩。”所谓“规矩”,可以理解为“规矩自然方圆成”,审美风尚在温文表裕、丽则凝华、文旨兼深中一点一滴的调整。这些文论看起来持论中允,其实是采取了“折衷”原则,是“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1]571}在正反问达到平衡和谐,将相反的事物调和在一起,完成美学与艺术的综合。其优点是不会偏执过头,较为客观公允;缺点是墙头草两边倒,若跳不出这个圈子,也就找不到新的解决之道。

初唐对南北朝文风的“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看似酒是最新酿制,其实还是调兑出来的。见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李延寿《北史·文学传论》都出现过的一段话,“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贞义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如果说,沈约和萧纲他们

是在文采、雕饰之间寻找着平衡点，那么到了这里则将南朝文章作为声实俱茂的对象，将北朝文章作为词义典正的对象，各自区别对待，但并不盲目否定，表示皆可接受，在试图寻找到全新的为文模式的过程中，翻出些许新意。这种斟酌下的姿态，得力于表述这种认知的史学家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学史的眼光，比起南朝只是认同文学创作中的合理性更进一步。

综上所述，“自然”自南朝成为文论中常见的一个命题，直到初唐的发展，我们需要客观评价。因受时代所限，“自然”是诗文共同享有的命题，不免有含混之感。更重要的是，此时“自然”更像是一种共通的文学理想，虽然能实践到什么程度是个未知数，但不可否认，它为“质文半取”的健康文学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可以说，文论中总是给出如此的解决办法，执其两端而用之，虽不治本，却能治标，以两相融合为药引子，开出了一剂温和的药方。

二、唐宋文统对“自然”的省思

在韩柳开创古文运动之前，以初唐四杰为主力，对风雅文风的复归，已为其营造着合适的氛围。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言“斯文”一词，并说“微言既绝，斯文不振”。“斯文”典出《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指代儒家敦厚教化的典籍传统，内容是与天地自然相合的“古人之道”或者“圣人之道”。对雅驯文章而言，“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众持则力尽，真长则伪销，自然之数也。”^{[4]35}“自然”是无所不在的“道”的代名词。初唐已隐约感觉到，学习圣人的文章“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不只是考虑文风，也是继承代代积累的文统，文之价值究竟在何的问题。卢藏用甚至直称陈子昂是在道丧五百年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5]3}大力拯救斯文的人。

这样泛文论的调子，已和古文运动合上了拍。韩愈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让古文运动风起云涌，应和者甚众，这种重建“文统”的心理活动，才

是思想的根本动因。前文已讨论过，初唐时的文学史观是“折衷”原则，对象是南北朝。但中唐后对古文发展脉络的梳理，开始有了典型的构建“文统”的意识。作为“文”生成的历史渊源及统绪，以萧颖士为起点，“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6]3276}“又何东晋、后魏、梁、陈、周、齐之足道哉！”^{[6]3267}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中的转述，也是推举《六经》、贾谊、杨雄，最晚才到左思，中间直接跳跃几百年。再有李华、贾至则以“五经”为根本，“将求致理，始于学习经史，左氏、国语、尔雅、荀、孟等家，辅佐五经者也。”^{[6]3213}到了独孤及，承认正是从此三人开始“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尤其是李华，“与朋友交，然若著于天下，其伟词丽藻，则和气之余也。”“虽波澜万变，而未始不根于典谟。”^{[6]3946}“文统”从先秦、两汉接续到了中唐。除此之外，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许孟容《穆公集序》、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皆以时下“安得遭遇乎斯文也”^{[6]5261}、“唐兴几二百年，绍闻周汉之逸轨，以人文华国”^{[6]4997}为三代及秦汉之文的继承者。最后，才是韩愈用“道统”链条式的总结，时人评“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6]6276}稽古斯文，归于正声。

文统的率先构建，让古文运动有了“道”的意义。张九龄《徐文公神道碑铭》：“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学。”许孟容《穆公集序》：“诵六经得其研深，阅百代得其英华，属词匠意，必本于道。”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这乃是时人的共识，也是古文对文之道的认识的高峰期。中唐时涌起文人间为文集互相做序的风潮，现见《全唐文》中所有著录，开篇几乎皆以“原道”为中心，用宏大的视野审视古文。其一，论古文出于自然天地间，文德应天；其二，论性情出于自然天成，明心达意；其三，论为文过程的自然而然，泰然自若。在古文家看来，古圣之文完全符

合这三点,才能历经世变而传扬千古。独孤郁《辩文》以“其何故得以不得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谓也。”解说中着力突出“自然”二字,“人之文位乎其中,自然之文也。”虽不免有浓厚的道德教化意味,但极力主张“自然”成文,“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属于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之后各家主张固然各具特点,不过是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不同侧面、不同方式去阐释罢了。

李商隐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评论元结文:“其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次山之作,其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易移之。”时危世乱,元结心中悲苦忧伤落于笔下,使古文境界高远,情韵悠悠。“疾怒急击,快利劲果;出行万里,不见其敌;高歌酣颜,入饮于朝;断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孙,竞于跳走。”文风之姿是“自然”、“元气”发挥作用,突出为文由内在的激荡感情,到外发的浩然气势。韩愈曾言:“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6]5646}内外契合是因有气行于其中。崔恭为梁肃做《文集序》:“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词,辞不当则文败矣。”李翱《答朱载言书》中言:“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权德舆提出要“尚气,尚理,有简,有通”^{[6]5052},韩愈更是多次论气满、气盛的积极作用,“水大而物物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5588}“气”不是人造的,它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金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反,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窃眇。”^{[6]7280}

李德裕《文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这前后的逻辑,是能够关联起来的。唐人也确实欣赏风神气象。梁肃评李翰文:“叙治乱则明白坦荡,纾徐条畅,端如贯珠之可观也;陈道义则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涣乎春冰之将泮也。”^{[6]5216}皇甫湜评韩愈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飏激浪,瀚流不滞。”^{[6]7035}古文

有由自然性情流泻抒发而形成的气势。长于此者往往短于思理的精密,长于论理者又往往缺乏拨动人心的言辞力量,但唐之古文却恰恰没有,正如石介《上赵先生书》的总结:“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于日月,浑浑灏灏,浸如江海。”这正是它们在文学史中的可贵之处。

皇甫湜反驳有人批评古文中用奇字、险字来博得新异之风,而用“自然”论之。其《与李生第一书》:“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鸦;金玉之光不得不烜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把文字的怪奇解释为“意新”、“词高”,是超常出众的表现,如同自然界的虎豹之文、鸾凤之音、金玉之光等有珍奇寻常之别。所以说,高于俗众的怪奇,本就是文坛中必生的自然现象,故“固当以出拔为意”,表明创作自起始时,就应有不同凡响之志。文求新奇观念无可厚非,韩愈也说过“唯陈言之务去”以至于“汨汨然来矣”的通畅,最后达到“浩乎其沛然”的喷薄而出,从积累到爆发,是不需要外力控制的。但皇甫湜发挥过了头,文奇而理正的难处正在于文易奇而理难正,“彼巧在文,摘奇擎新,辖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韵调声,绝浊流清,雕枝镂英,花斗巢明。至有破经碎史,稽古倒置,大类于俳,观者启齿。”^{[6]5461}也就是“以文字为意”,力道用到了相反方向^[7]。真正的经典之文是自然形成的,“虽大弥开地,细入间,而奇言怪语未已,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6]8332}文采随表达的需要自然形成,但如果为文而文、自非常则,便是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一般的奇言怪语、博人眼球。

由此看来,唐古文家的“自然”观念仍是因循守旧,新瓶装旧酒,创新仅在借助了复兴“文统”大旗,依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策略,将其中理路逐一辨析明白。中唐将古文推上了文坛高台,多少有些意气用事的味道,却鲜有文法上的反思。而新的阶段,要待北宋欧阳修、三苏等古文家的粉墨登场,起落转折间力倡新变。

三、“文理自然”与文法的自觉

诗歌史常用唐诗重风神、宋诗重理致为唐宋

文化类型的分野，实则古文中亦有之。周必大《皇朝文鉴序》言：“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不甚盛哉？”明显有对唐文、宋文不同的认知。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又云：“散文至宋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称赞宋古文为“真文字”，取韩柳之长，去深僻词涩言苦之短，方确立了流丽稳妥、新颖自然的风尚。

宋古文之所以能独立一家，与其文论中的理性思考攸戚相关。尽管以欧阳修为首文人团体仍是松散结构，在多时多地会出现对古文内容、特质的多元认识，继之三苏、曾巩、黄庭坚、吕本中等人的理论也在持续发展。但从总体看，文论显示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内在的逻辑关系日渐清晰。韩、柳、皇甫等人从“文统”的高度确立了古文的价值地位，北宋初年的田锡、柳开、穆修、石介，也还在这个圈子里兜兜转转，从自然之道的高度，比拟古文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有说古文是出于天造者，有说古文发乎性情者，它是不由人力掌控的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再现，是师法自然的结果。这一点，至始至终地贯穿在宋代文坛的讨论中心，被称为道学之儒，但他们在古文创作上，几乎没有任何突破。真正更上一层楼的，则是有着大量实践创作的文学家，也可称为文章之士，当他们把朝向“自然”的视线从天地之道的角度移开，关注过程中的“自然”，即创作主体的状态及与平易流畅为共同艺术特征间的关联，“自然”在文论中方有了新的主张。

一马当先者，是为欧阳修。其《与涇池徐宰〈无党〉六通》中：“所寄近著尤佳，论议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如其当宜在心也。”第一，重议论的古文，要能简练而有法度，气足而不嚣张，就像苏洵评语：“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疎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极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8]25}第二，这样简洁明洁的文风，不可刻意求，只可心中得。南宋张鑑中《仕学规范·作文》引曾巩《与王介甫

书》：“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而。”里面涉及到欧阳修对唐古文的认知，不是单纯模仿韩孟的文采辞句，是务求理得语顺，不工自工，在不经意间的师心独造。欧阳修并无什么振聋发聩的见解，但若将其移回所在的时代背景，它的救弊意义不言而喻。当时，欧阳修位处文坛盟主之位，在各家都找不到古文健康的前进方向时，将“简而有法”与“自然之至”相结合，“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8]392}

苏洵则用“自然”阐明“天下之至文”的主张，以风水相激，无意相求，不期而遇而形成的自然成文拟之。《仲兄字文甫说》：“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全文以水比喻平日积累，以风比喻刹时的灵感，满而上浮的水有待于风的鼓动，才能形成千姿百态的波纹，创作也如此，“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故曰：此为天下之至文也。”^{[8]162}这样自然成文即具有自发性、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规律性，所以是“不能不为文”也。苏轼也有类似的言谈：“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8]189}自然之文是得于心而应于手的产物，一并融入大自然的怀抱，物我两忘，浑化无迹。那么怎样才能到达这样的境界？苏氏父子的意见，“不能不为之文”，反对为文而文，以文为戏，轻率下笔，固然写不出好文章；被动写作，即使临文以敬，遣辞经营，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可惜与“自然”无缘。相比较而言，只有无心为文，意到笔随，与物俯仰。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另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如果说“天下之至文”讲的多是创作前的入境，而“文理自然”则侧重于创

作中,是苏轼对自己创作体验的精当概括,一下笔就能文如泉涌,信笔抒意,姿态横生,既不忸怩作态,也不故作高深,完全无斧凿之痕。此外,他教诲侄儿写作的尺牍也极富意味:“凡文字,少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是绚烂之极也。”^{[8]147}乃是出自肺腑的真切体验,似平淡而实为绚烂之极,这与“文理自然”是相似的美学风貌,是超越表象的繁饰,令人于自然平淡中产生无尽感悟的文字气象。

“文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古文内容表达出来的“理”。古文历来重理致,孙何《评唐贤论议》言:“文之要,莫先乎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论议为最。”文以理为主,学文之端在于明理,文是寓理的工具。理胜者,文不期工而自工;理拙者,虽巧为粉饰,仍漏洞百出。此处的“理”是宽泛的范畴,里面包括物理、世理、情理等,若能在文章中如实地把它们表述出来,就符合文理;若能够像四两拨千斤那样,成功地把它们转变为文理,那就是“文理自然”。曾巩“较质而近理”,以议论见长,立论警策,说理曲折尽意,有一波三折之妙,而又文辞和缓徐纾,从容不迫,与欧阳修的文风相近。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墨池记》等文,笔锋皆力透纸背,“落笔前言,指事析理,命物托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俊壮豪健,如走弹丸,如建瓴水,疏畅条达,无间断,无艰难辛苦之态。”^[9]二是古文文辞本身的“理”,指文辞的理路、肌理。“文到高妙处,只是理明。理明者,不着妆点色相,亦不用空活机锋,自然神义俱得。”这与欧阳修“简而有法”一脉相承,要求达到内涵渊宏与文辞简约,反对“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镂以为丽,句千言万,莫辨首尾”^{[8]345}。文之理的第一层是主心骨,第二层才是文的经络血脉,否则千言万语只能是一团散沙。苏轼曾说子由“词理精确不及吾”,苏辙答之曰“余文但稳耳”。文辞意义上的“文理自然”更强调内深外简,“物固是有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8]370}苏轼在评价欧阳修时也表达出此意:“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

服人心。”^{[8]345}等同于《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谈及的“辞达而已矣”,又正好与他以“自然”论文相吻合了。

客观地说,这并不容易实现,用言辞把文理表述清楚,难免要在行文方法上下功夫,而这样又难免不合“自然”。行文虽有理,其妙不外乎自然合节;行文虽可组织,却须动合自然,勿露镶嵌之气。归根到底,这种境界只有在“无法之法”的情况下才能达到。

四、结 语

在今日,我们之所以觉得唐宋古文难得可贵,原因即在于,唐宋古文家认识到了自然为文的重要性,其中含有文统的自然、文理的自然、文辞的自然、文义的自然,这些自觉地规范了古文的创作;之所以觉得唐宋文论承上启下,原因则在于,唐宋文论家虽没有确立文法,强调作文需有哪些字词、章句的法度绳墨,但文法诸多的原则、因素早已蕴含其中。有此作为基础,后来的明清文论中认为唐宋文是“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10],意谓唐宋古文“自然”之法也出于自然,那便不足为奇了。

参 考 文 献

- [1] 刘勰,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2]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 纪昀. 纪晓岚评《文心雕龙》[M].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 [4] 包弼德.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5] 宇文所安. 盛唐诗[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 [6] 董浩辑.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 曹胜高. “文字为意”与唐宋诗文的理论反思[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1(4):55-59.
- [8]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9] 孙觌. 鸿庆居士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唐顺之.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M].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下转第58页)

脚步也越来越快,随之也带来建筑垃圾的产量逐渐增加,大量的占用土地资源,浪费可再生利用的资源,所以采用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的模式势在必行。结合西安市自身发展情况,目前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和实施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作为研究人员和相关资源化企业共同发展,政府部门相关人员需尽快出台有利于再生资源产业的政策,同时也需要公众与从业人员的大力配合,以推动西安市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模式的应用,加快建筑垃圾的可持续再生循环利用,共建资源节约型社会。

参 考 文 献

- [1] 李颖,陈家珑,郑胤. 建筑垃圾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J]. 建筑技术开发,2008(12):39-41.
- [2] 高青松,谢龙. 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链关键节点及产业发展驱动研究[J]. 生态经济,2014(6):137-141.
- [3] 陈梅丽. 基于RS理论的建筑垃圾资源化模式评价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4.
- [4] 齐丹丹,胡鸣明,石世英. 建筑垃圾资源化关键成功因素分析[J]. 建筑技术,2012(7):601-604.
- [5] 何晟,洪毅,钱丽燕. 苏州市建筑垃圾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J]. 施工技术,2015(6):58-60.
- [6] 魏秀萍,赖芟宇,张仁胜. 建筑垃圾的管理与资源化[J].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3(3):25-27.

A Study on the In-place Recycling Mode of Construction Waste in Xi'an

CAO Jin-feng, ZHAO Ping, CHEN Mei-l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Xi'an economy and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the urbanization scale has been enlarged, the urban villages demolished and renovated in the city, the Sci-Tech and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ed, and the municipal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accelerated. It becomes a serious problem how to dispose the great amount of resulting construction waste effectively.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ere the construction waste is disposed in a traditional way in Xi'a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then proposes a mode of in-place recycling accordingly. The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place recycling mode of construction wast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to propel the in-place recycling of construction wast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waste; present situation of disposal; in-place recycling

【编辑 程广平】

=====

(上接第46页)

“Naturalness” and its Norm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ZHANG Jia-zi

(School of Liberal Art,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 “Naturalness” was taken as a topic discussed in th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hen critics like Liu Xie and Xiao Tong praised the idea of the natural literary grace and the writing style balanced with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reestablishing the Confucian literary tradition along with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Mid-Tang Dynasty, th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ists introspected into “Naturalness” in various ways. Thereafter, in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of early North Song Dynasty they presented a clear view of natural literary context and natural literary structure,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in North Song Dynasty is unique in its style. The introduction of “Naturalness” in the literary theory makes it a norm to create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as well.

Key words: naturalness; natural literary grace; natural literary context; natural literary structure

【编辑 吴晓利】